
吳雷川著

基督教與中國文化

吳序

吳雷川先生撰著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一書既竟，囑我爲它寫一篇序文，我以自己的學識譾陋，對於基督教和中國文化都沒有深刻的研究，本不敢答應；但後來將此書細細讀過一遍，覺得它思想新穎，持論公允，而又能處處針對中國現在的需要，發人深省，因此引起我自己不少的感想，覺得有說幾句話的必要。又因爲著者是我多年的朋友，並且在年齡，學問和經驗上都是我所敬畏的一位前輩，不但情不可却，並且爲這一本有意義的著作，結這一段文字之緣，於我是一件榮幸的事，也是一件快樂的事；因此便不揣冒昧，寫了這篇文章，以就教於著者。

這本書把基督教和中國文化，分作兩部分來個別地敘述。對於基督教，它認爲就耶穌的教義而言，它是一個革命的宗教——謀求社會改造的宗教。它徵引了福音書中許多關於耶穌的言行，大膽地否認傳統的說法，以爲耶穌的宗教不是一般所謂精神的，個人的宗教，而是充分地表現着政治革命和經

濟改造的意義的宗教。對於中國文化，在學術思想之部，它是徵引了幾位學者的意見，以說明中國文化的本質；在政治社會之部，它是取批評的態度，把中國文化過去許多的弱點指出來。它不承認中國有「復古」的可能，也不承認可以用舊酒裝新瓶的方法，把舊文化的某些部分，機械地應用於今日的中國。在另一方面，它却不否認中國文化在過去的貢獻和對今日的意義。它正確地取一種演進的看法，從國際大勢和中國的需要，肯定中國社會的必需變革。從這兩部分的敘述，它便歸結到基督教之必需洗刷其過去的錯誤，發揚其所固有的社會改造的精神；中國文化之必須演進而成爲一種可以創造新社會的文化，並說明基督教在這演進中所特有的功用，尤其是造成領袖人材的功用。

這一本書可以說是從一個新的社會認識的觀點寫的。在一般人看來，這一個觀點也許並不怎樣新奇，因爲在近十年來，中國的思想界確是突飛猛進。社會改造的意識，雖然還沒有普遍於社會的各階層，可是在前進的知識分子，以至在覺悟的勞苦大眾，它差不多變成了天經地義，尤其是在「九一八」

以後，國際形勢的激盪，國難事實的啓示，使人感覺：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，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已經發達的國家，或是在生產落後的半殖民地，也不管時間有遲早之不同，方法有剛柔的分別，將要成爲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實。由於這種意識的傳播，一般人對於政治問題，對於經濟問題，對於一般的社會問題，以至對於整個中國文化，都取得了一種新的眼光，用它去衡量一切，批判一切；也是由於這種意識的傳播，非宗教的分子對於宗教，一部分是取極度批評的態度，一部分是取相對容忍的態度。批評的是覺得宗教在未來的社會裏沒有地位，容忍的是覺得宗教還有它一部分的真理。但無論如何，因爲他們所見到的宗教只是一種維持現狀的勢力，所以對它是沒有什麼熱烈的希冀的。

對於一般信仰基督教的人，這本書所提供的一些意見，可就取得不同的意義了。時勢的演變，把中國的，以至世界的，思想界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；但同樣時勢的演變，却還沒有把中國的，以至世界的，基督教思想界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。基督教的思想界，在這大變動的時期中，表示了三種不同的

趨向：第一種是出世的趨向，第二種是改良的趨向，第三種是妥協的趨向。出世的趨向是表示於種種的神祕主義和奮興運動。這一派思想，當然有精粗深淺的不同，但是它們之認為宗教對現世生活應當取一種超然的態度，甚至是兩不相干的態度，却是一致的。第二種趨向是表現於基督教裏面種種的改良運動。它所注意的是個人生活的改善，和現社會若干不良現象的廢除。這一種因不滿於現狀而產生的努力是極可嘉許的，也是與基督教的精神完全一致的，然而因為它忽略了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連繫性，也沒有了解社會制度對社會現象的關係，所以它對目前社會的危機是沒有認識，也是無法應付的。第三種是妥協的趨向。這種趨向，並不始於現在，但現在的政治形勢却更清楚地把它呈露出來。自從基督教在羅馬帝國變成了國教，它便幾乎做了政治的附庸；自從西方資產階級興起，它實際上又做了現制度的撐持者。大戰以後，若干國家建立了法西斯政權，所謂『極權的國家』(Totalitarian state)，代替了名義僅存的民主政治，於是萬有統於一尊，宗教不但失去指示現世生活的能力而同化於現狀，即連其本身信仰的自由，亦幾不復存在。這種

現象，在今日的德國，尤其顯著。若干先覺的份子，有見於此種危險，於是有了「教會抵抗世界」(The church against the world)的呼聲。以上三種趨向既日益普遍，於是耶穌入世革命的教義益晦，而基督教在這變亂的世代，遂益成爲一種無足重輕的力量。

本書所揭發的基督教改造社會的主張，到了最近，才在以上各種紛歧的思想中，獨露頭角，成爲一種新興的勢力。在二十幾年前，在美國便有所謂「社會福音」的提倡，但因爲在那時，現社會制度的弱點，還沒有充分地暴露出來，所以這一派的思想，並沒有多少人注意。到了最近幾年，惡劣的社會現象，逼着人不得不思想宗教對社會所應取的態度，於是耶穌社會改造的福音，重被發見，而基督教革命的呼聲，始爲一般人所注意。我認爲這一派思想在今日的中國實在有提倡的必要，所以本書的出版，更可以說是有着時代的意義。與這一種思想同時發展的就是基督教神學思想一般的轉變。以前的所謂近代主義運動(Modernist movement)更演變爲一種以科學和經驗爲基礎的新神學運動。它企圖把宗教思想變成合理化與近代化。這一派思想當然更適

合於現代知識份子的口胃。至於它的是非得失，我們就不能在這裏討論。但由於這種運動，若干因現代思想的侵襲，在信仰上徬徨的人，便恢復了，穩定了他們的信仰，而若干還在宗教門外的人，也因此便對宗教發生了追求的興趣。在物觀的反對宗教者看來，這些「進步的」宗教，比之守舊的宗教，其危險性更大，但我們當然是不同意於這種意見的。

說到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，本書著者的態度，也是值得我們嘉許的。他既不拘泥於中國過去文化之特質，主張基督教與它「調和」，也不像一般膚淺的批評者，認為基督教和中國的文化，都是時代的渣滓，應當完全放棄。他所主張的却是「基督的更新與中國民族的復興」，而認為前者對後者必然有它的貢獻。我們贊成這種主張，我們應當為這種主張努力，使基督教在未來的中國，不致再蹈它在西方的覆轍。我們更相信：從中國文化所遺留下來的，處處顧到現實生活（唯實主義）和不大喜歡神祕和玄談（自然主義）的傾向，將使我們對於現代基督教的社會化運動和科學化運動，更能作有力的貢獻，以發揚基督教所固有的精神。

末了，對於本書論及基督教之處，我願意提出兩點意見，和著者討論。第一是關於耶穌工作計畫的解釋。本書認為耶穌最初的計畫包含兩點：一是他確要取得政權而作復興猶太的基督；二是他預備取得政權後就行改造社會的主義。又說耶穌對於計畫的第一點，後來確是轉變了，至對於第二點，則始終沒有轉變。關於這兩點，雖然著者舉了福音書上若干的事實來證明，（參看耶穌為基督一章）我覺得在解釋方面，還是有商量的餘地。我個人的意見大體是這樣的：

（一）耶穌對於整個工作計畫，在「曠野試探」時，經過深刻的考慮與祈禱，大體上已經決定，至少在短短的工作時期中，在原則上不致有所改變。

（二）耶穌深知社會改造不是旦夕間可以實現的事，因為社會改造至少必須先經過一番宣傳啓導的工作，使大眾有所覺悟。因此，耶穌的計畫，與其說是企圖馬上實行社會改造，毋寧說是做了社會改造在知識和靈性上所必需的準備工作。

(三) 改造社會自然要取得政權，但人民沒有準備而取得政權，時機沒有成熟而取得政權，那是不澈底的，是耶穌所決不肯爲的，因此，與其說這是耶穌後來的轉變，毋寧說這是他的預定的方針。

(四) 由於以上的解釋，耶穌對「基督」這稱呼的見解，(甲)不是一般人所希冀的純民族主義的，狹義的復興猶太的基督，(乙)也不是急功近利的以實現我們現在的所謂「社會主義」爲目標的基督，而是(丙)以整個的人生的改造爲目標的基督。這目標自然包含了我們現在所了解的「社會改造」，然而比它更廣大，更深厚。我相信這一個意義從始就在耶穌的心裏，然而因爲它過於高深，一般人固然不能接受，就是門徒們始終也沒有了解，甚至在耶穌死後。

第二，是與第一點有密切關係的，關於基督教理想，和從這理想出發的對於國家，政治，戰爭，諸問題的態度。本書對於這些問題的看法是：

「基督教固然以全人類得救爲博愛底目的，但社會進化有一定的程序，不能躐等而幾。」(頁二九〇)

「基督教有所謂「無抵抗主義」，每爲指摘基督教的人所藉口。其實這種無抵抗主義，只是個人與個人間在某種情況之下所應用的事理，本不是爲國家民族說法的。」（頁二九〇）

「基督教唯一的目的是改造社會，而改造社會也就是尋常所謂革命。縱覽古今中外的歷史，凡是革命事業，總沒有不強制執行而能以和平的手段告成的。……所以有人高舉唯愛主義，說基督教不可憑藉武力以從事革命，這種和平的企望，我們在理論上固然應當贊同，但從事實著想：如果要改造社會，就必需取得政權，而取得政權又必需憑藉武力，倘使基督教堅持要避免革命流血的慘劇，豈不是使改造社會底目的成爲虛構以終古？」（頁二九一）

以上所引的話，一部分我可以完全同意，但另一部分我覺得還有討論的餘地。因此，我便把我個人對這問題的意見，簡略地敘述於下。

我與本書的作者完全同意的，有以下的幾點：

（一）基督教並沒有叫人不愛國；受真理指導的國家建設和民族解放正

是全人類得救一個必經的階段。

(二) 基督教應當參加政治活動，因為宗教生活是包括人生的各方面的。

(三) 基督教的目的 是人與人的合一(愛)和人與上帝(真理)的合一——這當然包括社會改造。

我覺得還可以考慮的有以下的一點：

(四) 關於革命的手段，我認為應當把耶穌自己的主張和今日基督教可能採取的方法，分別而論。耶穌自己的主張，我認為是絕對唯愛的，非武力的，然而它却不是縱容放任的無抵抗。但今日的基督教和一般基督徒——更不必論其他的人——却還沒有達到追蹤基督，實行他的最高理想的程度。因此，就事實論，「強制執行」是不可避免的。但這只能說是基督教的妥協，而不能說是基督教最高的理想。耶穌的教訓是一致的，他沒有把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分開——事實上這也不可能。美人 Reinhold Niebuhr 氏在他的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（青年協會出版）曾指出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因為性質不

同，不能應用同樣的方法，但在他的釋基督教倫理（*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*）他却承認耶穌唯愛的教訓的絕對性，並說：由於人類天然的缺欠（罪），人類對這絕對的理想，無論怎樣努力，也不能登峯造極，因此他便承認非唯愛的武力在現社會生活的必要性。我認為這種說法，比較近於真理。

以上兩點，關係頗大，但因限於篇幅，不能在這裏作詳細的討論，只能把我個人不同的意見指出來，以請教於著者，並供讀者的參考。

吳耀宗 一九三六年 八月廿六日

自序

在前年六月間，我的朋友吳耀宗先生給我來信說：『青年協會的三年出版計畫中，有一本書是「基督教與中國文化」，要請你撰著。字數請你酌定，最好多不過十萬字，少不減於六萬。請於一年內寫成，明年五月底以前交稿。』當時我因為（一）基督教末次來到中國，已經一百餘年，中國知識界中人信仰基督教的也不少，卻還沒有人以本國文化為立場參合時代思潮來論述基督教，寫成一冊比較具體的文字，我早已引為憾事。（二）按照所限制的字數，這本書的內容，似乎難於繁徵博引，有詳細的敘記，我或者可以藉口於此，掩飾我所寫的內容疏略。於是我不度德量力，貿然地回信應允了。

我既應允了寫這本書，在前年暑假期中，曾略加思索，想要擬定大綱，才覺得這本書標題為『基督教』與『中國文化』，當然是要說明二者的關係，既要說明二者的關係，就必得對於它們的本身有充分的認識。但是，以

具有四千年歷史的中國文化，傳播世界已經一千多年的基督教，它們的本身都是高明，博厚，而且悠久。要說是認識了它們，能分別提綱挈領地陳述出來，更說明其所有的關係，真是不易着筆，因而就暫時擱置。學校開學後，我忙於授課，又時有人事紛擾，經過半年，還未寫得一字。到了上年春季，我又在學校多任一門功課，更少有空暇來寫書，只得向青年協會請求將原定五月底交稿的期限展至年底。原希望在這一年的暑假中屏絕諸務，努力寫成；不料五月底我就得了病，醫生說是需要長期休養。我勉強支持到六月上旬，將校課結束後，向學校提出辭職；承學校准我休假一年，我靜養了五個月，體力漸漸地復原。從上年十一月間起始，我纔動手寫這本書。

時間經過了七個月，這十多萬字的書稿纔算是勉強地寫成了。在別人想來，必定是有如俗語所說『慢工出細貨』。但在我自己看，實在還是粗疏得很。這自然是因為我對於基督教，對於中國文化，都沒有充分的認識，所以不能有獨到的見解和透闢的議論。我想到青年協會，想到我的朋友吳耀宗先生，都難免要因此失望，我不能不深致歉意。倘若青年協會竟將這本書付印，

使它與讀者相見；我只盼望能得着許多讀者的指正，並且有人因為不滿意於我所寫的而重寫一本更精密更豐富的書，那就是所謂「拋磚引玉」，我或者不無微勞足錄。

再者，在青年協會約我寫這本書，大概是希望一般知識界的人看了這本書就能對於基督教有所了解；而我個人之所以勉力寫這本書，更是以青年學生為對象，很希望現代的青年學生——無論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——都能了解耶穌，了解基督教，因而負起復興中國民族，為中國創造新文化的責任。因為我在教育界工作了三十年，和許多可敬可愛的青年學生接觸，深知中國民族復興的責任，無疑地是屬於現代青年學生。倘使一般青年為了覺悟自己所負的責任，就趁着在求學時代，除了求得知識與技能之外，更多方尋求於修養人格有益的途徑，慎思，明辨，而後繼以篤行，或者這本書也能有些微的貢獻。

當我寫這本書的時候，正值華北風雲變幻，平津各學校學生罷課遊行，響到全國各地。因着時局的嚴重，使多少青年憤慨不安，荒廢學業，我的

精神上感受不可言說的痛苦。有時擲筆徘徊，屬稿屢屢停頓，但同時對於青年的期望卻更爲熱烈。這是值得我附帶聲明而要求讀者紀念的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三日，吳雷川寫於北平西郊朗潤園。

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目錄

吳 序

自 序

第一章 引論.....(一)

第二章 耶穌事略.....(一一)

第三章 耶穌訓言綱要.....(四八)

第四章 耶穌爲基督.....(八二)

第五章 基督教在世界歷史上的價值.....(九九)

第六章 基督教與中國的關係.....(一二三)

第七章 中國文化已往的檢討上(學術思想之部).....(一五一)

第八章 中國文化已往的檢討下(政治社會之部).....(二〇五)

第九章 中國文化未來的展望.....(二三九)

第十章 基督教更新與中國民族復興.....(二七四)